

二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历程^{*}

张秋生

内容提要 二战以前,在“白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华人基本上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二战以后,随着中澳建交、“白澳政策”的废除,特别是华人自身整体知识水平和参政意识的提高,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权利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系统地阐述了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历程及其特点,指出了澳大利亚华人参政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关键词 澳大利亚 华人 参政

在澳大利亚,少数民族的参政程度是由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决定的。二战以前,移居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多为劳工,加之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低,华人在“白澳政策”长期推行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参政根本无从谈起。二战后特别是 1972 年中澳建交、“白澳政策”废止以来,澳大利亚华人在人口数量、教育、职业、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新一代澳大利亚华人,他们大多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享有澳大利亚公民的全部权利。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力量的增强、人权观念的勃兴和自身参政意识的觉醒,澳大利亚华人逐步认识到,为了保护华人社群的整体利益,争取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益,他们需要关心政治,这是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积极参政的主要动因。而澳大利亚长期实行强制性的选民登记与投票制度及多元文化政策,也在客观上推进了包括华裔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群体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此外,澳大利亚华人积极参政还与自身对融入主流社会的认同有密切的关系。

一

澳大利亚历史上很早就有华人参政的记载,如朱俊英曾于 1913 年当选为澳大利亚联邦上议院议员,他是进入澳大利亚国会的第一位华人。^① 1966 年,陈天福出任达尔文市市长,为最早担任市长一职的华人。但总体上说,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起步较晚,其规模亦难与东南亚、美国华人的参政规模相比。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显现出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局面,出现了像沈慧霞、余瑞莲这样杰出的华裔女议员,像 25 岁就步入政坛的刘威廉这样的澳大利亚华人史上和联邦议会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而且各州均有华人当选为州议员,特别是著名华裔建筑设计师曾筱龙经过华人各界的大力推戴,于 1991 年当选为悉尼市副市长,这是澳大利亚建国二百余年来华人取得的最重要职位。这说明澳大利亚华人已认识到在这个

* 此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前期成果。

① 参见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大洋洲与非洲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 34、49 页。

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度里少数民族参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标志着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与社会因素,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还面临着种种严峻的考验。

二

二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历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专业知识阶层的形成

二战前,澳大利亚华人多属劳工阶层,他们深受知识水平低之苦,因而对下一代的教育倍加重视,含辛茹苦地供子女读书。因此,在澳大利亚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踏入社会后,不再局限于所谓“华人职业圈”,即餐馆、商贩、茶农等传统行业,而是以专业人士的身份跻身于白人一统天下的“澳洲人职业圈”。其职业构成从过去的“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刀)发展为“六个师”(律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高级技师和大学教师)。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来自东南亚和香港、新西兰等地的华裔学生赴澳大利亚留学,他们学成后获得居留权,便留在当地谋求发展。70年代以来,从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中,有很多人是具有专业技术或工商行政管理经验的精英;从中国大陆和台湾移居澳大利亚的人士,亦不乏高学历者。而且,这些人多在澳大利亚教育界、科技界、医药卫生界、工程技术界、法学界和商界谋职。这样,在澳大利亚华人总人口中专业人士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二战前和1966年的水平。据西悉尼大学冯兆基教授等主持的《在澳中国留学生实况总体分析》载,中国大陆赴澳新移民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占42.5%,其中28.6%为硕士研究生;具有高级职称者占4.2%,有中级职称者占49.8%;^①现在,仅在新南威尔士州高校及科研机构中任职并已获高级职称的华人就有500人以上。

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力地增强了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意识,并直接影响到参政的效果。刘威廉、沈慧霞和邝鸿铨、曾筱龙等一批参政成功者均为杰出的华裔专业人士,这充分说明了知识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新一代澳大利亚华人比其前辈们具有明显优势,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的语言、思维模式和思想观点正逐步当地化,从而成为华人融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理念与要求已不同于其一向轻视政治的父辈,而是与所在国的政治潮流相接近,并了解作为一个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懂得“民权不是靠赐与的,而是靠积极参与争取到的”。通过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排华史,他们看到了政治权利对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要想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在各级政府和议会中必须要有本民族的代言人,因而毅然决定投身于政界,为自己的民族说话。正是由于这样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出现,华人的参政意识才日渐增强,使其参政具有了厚实的基础。同时,华人精英从政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带动了各个不同阶层的华人关注和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

(二)参政成员构成的多样化

澳大利亚华人积极参政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90年代出现高潮,在澳大利亚各州均有多名华人进入政界。从他们的年龄、性别、出生地和职业构成等方面看,既有青年,也有中老年;既有土生华人,也有第一代移民;既有男子当选市长,也有妇女进入议会;既有律师、医生参

^① 参见杨力:《澳洲华人新移民的崛起》(1996年厦门国际华侨华人学术讨论会论文)。

加竞选,也有商业家和学者步入政坛。

华裔青年和妇女踊跃参政并取得杰出成就,是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勃兴的重要里程碑。1990年,年仅25岁的华裔青年刘威廉在昆士兰州国家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一举击败20名竞争对手,当选为联邦参议院议员,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华人史上继朱俊英之后进入联邦议会的第二人,也是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①刘威廉当选后,澳大利亚各主要报刊都对他作了专题报道,将他称为国家党的后起之秀、澳大利亚政坛上的一颗新星。

华裔妇女沈慧霞和余瑞莲分别当选为新南威尔士州和南澳大利亚州的上院议员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华人参政的整体实力与水准。

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华人最主要的聚居地,约有10万华人。但在全澳最早的立法机构新南威尔士州议会中,却长期没有华人的代表。担任新南威尔士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州高级法院大律师和北悉尼高等技术学院教师等职的沈慧霞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唤醒华人的参政意识,并向澳大利亚人证明,华人不仅有参与政治的责任感和热情,也有管理国家的能力。1987年,沈慧霞被自由党提名为该党竞选新南威尔士州上院议员的候选人。由于沈慧霞是华裔,又是第一代移民,且只有6名自由党议员任期届满需改选,她却在候选人名单上排列第七,因此当时的形势对她并不是很有利。然而,经过18个月的激烈竞争,她最终以18.3万张选票从37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州议员。

余瑞莲1954年从新加坡赴澳大利亚求学,先后取得医学学士和法学博士等学位。毕业后她留居澳大利亚,行医多年。由于职业缘故,她和社会各阶层接触广泛,对澳大利亚社会的许多问题具有比常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参政热潮的影响下,余瑞莲萌发了参政的想法,于1988年加入自由党,并很快显示了出众的政治才华,成为党内骨干。1990年10月,南澳大利亚州上院举行补充退休议员席位的竞选,余瑞莲被推举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角逐,她以其卓越的成就与雄辩的演讲征服了选民,一举战胜11位男性对手,成为南澳大利亚州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议员,开始了为期7年的议会生涯。

如果说以刘威廉、沈慧霞、余瑞莲为代表的一批华裔青年、妇女步入政坛仅说明了华人参政的广度,那么邝鸿铨、曾筱龙竞选达尔文市市长和悉尼市副市长并获得成功则反映了华人参政的力度与深度。

邝鸿铨是澳大利亚第三代土生华人,1944年进入阿德雷德苏格兰学院深造,毕业后回到达尔文市从事商业活动,成为当地颇有财力的商人。1982年初,邝鸿铨开始涉足政坛。1984年,他成功地当选为达尔文市市长。在此之前,曾有华人陈天福于1966年出任过该市市长一职,但当时达尔文市还未成为首府市。因此,邝鸿铨便成为全澳有史以来首位首府级市的市长。上任后,邝鸿铨进行了广泛的民情调查,认真听取各族代表的意见,了解他们对市政府的要求。他全力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处理政务上,以维护全市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并注意照顾到不同族裔的实际情况。在他任市长期间,该市各族裔关系融洽,从未出现过种族歧视和种族纠纷事件。他的出色工作和高尚人品赢得了市民的尊重与爱戴,并获得达尔文市“荣誉市民”的称号。1988年,他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蝉联达尔文市市长。

曾筱龙祖籍广东,18岁时自香港负笈到澳大利亚读书,1964年考入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系,后又进入悉尼大学建筑系深造,获建筑学高级文凭,并成为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学院委员会

^① 参见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大洋洲与非洲卷),第34页。

成员。为维持生活和学业,他半工半读至大学毕业。艰辛的生活使他懂得,华人只有自强不息,打入主流社会,才能被当地社会承认。多年来,尽管他设计过许多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但他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他精心设计了悉尼唐人街牌坊、悉尼西区大型天后宫、卡巴拉玛打市场牌楼及澳华疗养院等,备受澳大利亚华人和各界人士喜爱与好评的悉尼“中国花园”的设计也出自他的手笔。

作为工党党员,曾筱龙因其杰出的成就,于1991年被提名为参加角逐悉尼市长和市议员的首席候选人。当被问及参政目的时,他明确表示:“现在澳洲的华人移民越来越多,华人社区应该不断向澳洲社会显示其经济与政治实力,以主人公的姿态在澳洲社会占据应有的地位!”^①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是:“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加强华人团结,为华人寻找福祉,促进悉尼市繁荣安定并扩展和美化华埠。”^②这一主张得到了选民的拥护,特别是悉尼华人社团抛弃门户之见,大力拥戴曾筱龙,使其顺利当选为市议员。随后,他作为工党唯一入选议员,参加有7名竞争者的市长竞选,后仅以一票之差而屈居副市长职位,成为悉尼开埠150年来当选为副市长要职的第一位华人。这标志着澳大利亚华人在参政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由于政绩卓著,在1992年9月举行的悉尼市市长年度选举中,曾筱龙又连选连任。

除此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华裔商业家苏西、学者陈英群、优秀青年陈德同分别当选为墨尔本市、吉朗市和阿林活市的议员。1994年6月澳大利亚联邦人权及平等机会委员会反种族歧视专员邝惠莲出任新南威尔士州法官(澳大利亚第一位华裔女法官)……^③这一系列杰出成就充分说明,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在20世纪90年代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三)参政层面的广泛性与参政形式的多样性

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并不限于进入议会或政府机构,而是在各个层面上展开。而那些参政成功者,也多是以参与各个层面的活动为基础,积累丰富经验后步入政坛的。

如余瑞莲以医生职业为有利条件,经常深入民族社区,用自己的高度责任心和精湛医术赢得华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信任和尊敬。同时,她积极参与南澳大利亚州的卫生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工作,抨击执政的工党关于高福利以及劳动者工会的现行政策,认为高福利会导致一部分人的懒惰,有碍公平竞争和社会进步;工会制度排挤了未加入者,使其在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她还在医疗服务和移民问题等方面发表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这一切使她拥有了丰富的从政经验,为后来走上政坛打下了基础。

曾筱龙更是如此,他在出任市议员和副市长之前,就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他曾担任新南威尔士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为维护华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益做了大量工作。他提出市政府应广开言路,发展并完善咨询制度。他经常深入各少数民族社区,听取不同阶层、不同职业民众的建议,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不断大声疾呼,多方奔走,促使政府和社会关注并尽快解决问题。他曾就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种族歧视及人权问题多次通过新闻媒介发表意见,特别是与反亚裔的议员史东·布兰尼教授在电视上就移民问题进行的辩论,在整个澳大利亚引起了强烈反响。^④他特别关心华人社区的发展,为唐人街的改造和美化做了大量工作,并及时给中国留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赢得了华人的尊敬。为表彰他对少数民族社区

① 张秋生:《澳洲华人参政运动中的一颗新星》,载《华人之声》,1993年第3期。

② 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大洋洲与非洲卷),第188页。

③ 参见《华人月刊》(香港),1994年第6期。

④ 参见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大洋洲与非洲卷),第187页。

所作的贡献,澳大利亚政府于1991年6月授予他O.A.M勋衔。

华人史学家颜清湟为反对种族歧视和加强华人社会的团结,于1971年底和杨日文及华人会计师乔伊斯·何女士创办了当地首家华人社团——南澳中华会馆,并担任会馆主席8年、副主席4年。在职期间,他在政府资助下,开办中文学校,传播中华文化,开展慈善活动,安置了大批印度尼西亚难民。他以南澳侨领身份向当局力争,使阿德雷德大学于1975年将汉语列入教学计划。颜清湟深知华人只有团结互助、重视社会活动、争取发言权,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平等权益。经过不懈努力,颜清湟作为亚裔代表,被聘为南澳大利亚州教育部下属的半官方的多元文化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南澳大利亚州警察与少数民族咨询委员会委员。1987年,他又被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移民与民族事务部长委任为审查委员会委员。颜清湟利用自己的地位积极参政,向政府反映华人的要求与呼声,为维护华裔与亚裔的合法权益而奔走,赢得了华人社会的尊重。

高级会计师杨锦华长年活跃于维多利亚州华人社会,并担任华人社团和政府机构的多项职务。他创办了全澳第一所华人“安老之家”,担任过维多利亚州“侨友社”主席和澳大利亚民族电台华族组组长,发起创建澳大利亚第一个社团联合会——维多利亚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华联会)。杨锦华主张华人应积极参与当地事务,争取发言权。他支持华联会举办参政工作讲座、澳大利亚政治体制研讨会等活动。他坚信,这些活动将有助于提高华人的参政水平。同时,他还积极谋求与其他族裔社团的交往。从1979年至今,他先后担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移民与民族事务部直属的维多利亚州移民资源中心财政主管及主席,负责利用政府拨款协助各族移民开展社团活动,并兼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福利顾问委员会委员、维多利亚州司法部纠纷仲裁组成员。他及时向各级政府反映各族裔移民的意见和要求,使许多纠纷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

澳大利亚华人对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有力地抵御了少数种族主义分子的攻讦。正如沈慧霞所说:“积极参与各层面的政治活动,是唯一充分代表我们的意愿不被忽视的途径。”^① 华人参政及其所显示出的才华赢得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尊重,华人的地位也日益提高。澳大利亚自由党人福·纪·奈尔评价沈慧霞说:“有海伦(即沈慧霞)这样一个华人在议会中十分重要,她代表着那些华人和讲华语的亚裔人士的意见。她干得很棒,做到下情上达,其性情友善,勇于进取,令人赏识。”^② 澳大利亚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华人社区的作用。1996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竞选期间,代表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参加竞选的霍华德曾亲临“中国城”发表竞选演说,并表示将在华人社区发展自由党支部,以争取华人的支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移民与民族事务部部长鲍格斯也在1996年初“澳华公会”举办的一次集会上高度评价华人移民对澳大利亚所起的积极作用,并敦请与会的华人代表尽快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四)以党派为政治依托及华人群体的支持

澳大利亚实行多党制,党派林立、竞争激烈是其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但是长期以来,争雄于该国政坛的主角却是工党和自由党。因此,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架构比较完善的国度里,作为一百多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华裔要想融入主流社会,走参政、从政之路,为华人说话,仅有参政的热情和能力还是不够的,必须选择与自己目标一致、具有实力的政党,

① [马来]《星洲日报》,1990年3月29日。

② 庄炎林主编:《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大洋洲与非洲卷),第92—93页。

取得政治认同,依靠党派力量参加竞选,才易于取得成功。关于入党与参政的重要关系,沈慧霞指出:“因为国家的政策是由党提出,而党的政策是由党员作出的,如果不在党内,根本没可能提出自己的意见,无论哪一个党都一样。我参加自由党是因为坚信该党原则。”^① 第三代华裔刘威廉从小就受到西方政治的影响,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15岁时加入国家党,将大量课余时间用在参与国家党的政治活动上。当同学们在娱乐嬉戏、欢度周末时,他却在忙于各种政治聚会和党内事务,并显示了出众的组织才能和独到的见解。他曾担任昆士兰州国家党商业及经济委员会秘书。大量的党内活动锻炼了刘威廉,为他日后成功进入议会奠定了基础。

和刘威廉不同,身为第一代移民的职业妇女沈慧霞和余瑞莲,以前并无从政的热情和愿望。但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与现状使她们懂得了参政对华人的重要性,激发了她们参政的责任感。而只有积极参加当地事务,通过与澳大利亚人的接触和交流真正了解澳大利亚社会,并依靠党派支持,才能更易于参政和赢得成功。1982年,39岁的沈慧霞决心加入自由党,而余瑞莲直到1988年五十多岁时才加入自由党。应该说,不懈的努力和实践磨炼出来的政治才华,加上党派的支持,才使她们取得了参政的成功。

曾筱龙也是如此。在竞选市议员和市长之前,虽然他在澳大利亚建筑业界已闻名遐迩、成果卓著,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维护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益做了大量工作,但他并未参加任何党派。1991年参政前的大量切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少数民族必须通过参政来争取平等权利和改善政治、经济地位,而参政又必须在政治上有所依托。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参加了澳大利亚最大的政党——工党,并作为该党的首席候选人在悉尼市政府改选中脱颖而出,当选为悉尼市副市长。

广大华人的支持和华人社区的内部团结也是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成功的基本条件。过去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门户分歧明显,内耗严重,参政难以成功。近年来,澳大利亚华人中的有识之士在参与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中已认识到,如果华人社群内部仍如一盘散沙,将会一事无成。因此,他们纷纷寻找提高华人基本素质和增强华人群体凝聚力的途径:有的人士通过《华声报》、《汉声》等媒体来深化华人团结一致的参政意识;有的人士利用社团活动扩大选民登记的宣传,派志愿人员挨家挨户游说,鼓励选民去登记,提高了澳大利亚华人的群体意识和参政意识。在曾筱龙竞选期间,除得到大批华人选民拥戴外,同时一些知名侨领也为支持他而放弃了竞选。如在前届悉尼市议会选举时,另一知名华人何健刚与曾筱龙同时参选,相互争夺华人选票,分散了力量。在1991年竞选时,何健刚主动退让,曾筱龙对他的明智做法表示了赞赏和谢意。另外,曾筱龙还对前任新南威尔士州华裔自由党女议员沈慧霞表达了“不管党派异同,均要团结全体华裔,竭诚为华裔服务”的愿望。^②

三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一批杰出的澳大利亚华人陆续步入政坛,引起了海内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这些成就标志着澳大利亚华人政治意识的新觉醒,是澳大

^① 《华人月刊》(香港),1990年第9期。

^② 参见张秋生:《澳洲华人参政运动中的一颗新星》,载《华人之声》,1993年第3期。

利亚华人参政历史上的里程碑。

我们在关注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成就之深远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华人参政道路上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主观和客观方面的问题。如在白人占绝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中仍存在着种族偏见;传统的过客心态和小农思想使不少华人对竞选不抱积极态度;大批华人新移民忙于生计,无暇顾及政治;海峡两岸政治因素的影响,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人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凝聚力已成为澳大利亚华人和其他海外华人参政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在主流社会中,少数民族参与政治事务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但在所在国的民主政治架构中,只要华人坚持不懈,同心协力,终有机会取得成功。而且,在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方面也有许多有利因素,如华裔人口大量增加,目前已达 40 万人;西方的多党制度弊政丛生,澳大利亚的主要政党均无能力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外贸失衡、预算赤字等主要内政问题,同时,政府取代政党的功能,利益团体的出现、私人企业化竞选组织的兴起、各种大众传媒的运用,都削弱了政党的功能,增加了华人参政的机遇;随着更多外来移民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民主空间将更为广阔,白人种族主义难成气候,华人将有更开放、更公平的参政机会;许多华人社团领袖均学有专长,对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政治团体的运作日趋熟悉,参政能力日趋成熟,提高了参政的成功率。

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已使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华人认识到,团结一致和积极参政是争取华人自身权益、消除自身危机的重要途径。但要取得成功,还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解决好自我定位,抛弃视澳大利亚为异邦的“客居心态”,融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因为只有能接受西方社会的人,才能被西方社会所接受。二是正确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内涵与特质,不能一味迷恋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因为只有正确掌握和对待东、西方文化精髓与要义者,才能更充分地展现其所长。三是以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情来凝聚力量,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是被海外华人认同的必须具备的基本情操。四是加强政治训练,提高组织能力,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政治参与方式的复杂性并非华人以立党结社为主要参政方式所能适应的,华人必须培养自身的政治意识,经常参加政治活动,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学会组织、协调、动员支援力量。可以相信,随着广大澳大利亚华人政治意识的不断提高,经过一批批澳大利亚华人政治精英的努力,澳大利亚华人将迈进一个不断自我更新、通力合作、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新时代,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Abstract Chinese people were basically deprived of the right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hite Australian Policy" and some other elements prior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ince the World War II, alo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the abolishment of the "White Australian Policy", and particularly, the elevation of the Chinese's educational level and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whole,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s of Australia's Chinese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and points out the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and disadvantageous elements in this question.

(张秋生,教授,江苏徐州师范大学,徐州,221009)

[责任编辑:吴家多]